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72–284.**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5sseis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斯科特·奥台尔小说中的海洋印第安人的共生伦理研究

苏晓月（Su Xiaoyue） 朱 骅（Zhu Hua）

摘要：本研究以美国儿童文学作家斯科特·奥台尔的海洋叙事佳作《蓝色的海豚岛》、《黑珍珠》与《齐娅》为研究对象，以深层生态学与处所理论为双重视角，探讨三部作品中海洋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共生实践及其绿色家园构建。本研究以海洋原住民的生态节制为起点，进而分析其与广袤海洋空间中的动植物建立的共生关系，最后聚焦于海洋从物理生存场域向精神生态家园的升华。研究认为，奥台尔的海洋书所呈现的原住民的共生伦理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也为现代社会应对生态危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斯科特·奥台尔；深层生态学；处所理论；海洋印第安人

作者简介：苏晓月，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海洋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2351839072@qq.com。**朱骅**（通讯作者），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世界海洋文学、极地书写、中美跨国书写、离散与跨国主义理论等研究。电子邮箱: hzhu@shou.edu.cn。

Title: A Study of Symbiotic Ethics among Indians of the Sea in Scott O'Dell's Fiction

Abstract: Taking three masterpieces of marine narrative by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 Scott O'Dell--*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 *The Black Pearl* and *Zia*--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paper adopts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Deep Ecology and Place Theory to explore the symbiotic practices between Indians of the Sea and nature and place construction across the trilogy. Star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restraint of these Indigenous groups, 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symbiotic bonds they have forged with the fauna and flora of the vast ocean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focuses on the sublimation of the ocean from a physical survival space to a spiritual ecological place. It is argued that the symbiotic ethics of Indigenous peoples embodied in O'Dell's marine

Received: 31 Aug 2026 / Revised: 8 Sep 2026 / Accepted: 26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writings serves both a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anthropocentrism and as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modern society to respond to ecological crises and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Keywords: Scott O'Dell; Deep Ecology; Place Theory; Indians of the Sea

Author Biographies: Su Xiaoyue, student of Master degree study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world maritime literature. E-mail: 2351839072@qq.com. **Zhu Hua**（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1306）. Research fields: focuses on world maritime literature, Arctic writings, Sino-American transnational writings,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 E-mail: 1522983499@qq.com.

斯科特·奥台尔（Scott O'Dell，1898–1989）是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他毕生创作了近 30 部小说，荣膺无数文学桂冠，包括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国际儿童文学界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在耀眼的文学光环背后，奥台尔更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生态文学先驱与美洲原住民历史的深刻记录者，其生态意识深深根植于他的生命经验与加利福尼亚的壮丽地理之中。

1898 年，斯科特·奥台尔出生于洛杉矶，广袤的太平洋海岸和洛杉矶港口周围的岛屿构成了他童年最原初的生态启蒙空间。他自幼便与自然为伴，与海洋亲密接触，常在海浪中观察潮汐的规律，对大海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亦无形中促使他极早地培养出了生态意识，为其后的作品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奥台尔的一生与自然万物、生灵鸟兽相伴相生，如他本人所言，"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里总有大海的声响与边疆的气息，为什么我笔下的人物多是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和奇卡诺人。"[①]

美国学者大卫·拉塞尔（David L. Russell）称赞奥台尔"从生态角度理解人类生存的重要性"（2）。在奥台尔的文学世界里，自然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神圣主体，他以历史小说家的严谨与生态哲学家的悲悯，为现代工业文明敲响警钟，更为面临气候与物种危机的当代人类寻找一条回归生态自我的救赎之路。奥台尔写道，"那些侵入我居住的山区的猎人，他们屠杀一切爬行、行走或飞行的生物。"[②]奥台尔将对自然生灵惨遭屠戮的痛心与愤慨融入其创作之中，将叙事焦点精准地投射到了特殊的边缘化群体——海洋原住民。

为了具象化地勾勒这幅原住民的生态伦理图景，本研究将核心文本聚焦于奥台尔的三部经典海洋叙事佳作：《蓝色的海豚岛》（*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 1960）、《黑珍珠》（*The Black Pearl*, 1967）与《齐娅》（*Zia*, 1976）。三部文本从不同维度共同拼凑出了一套完整的海洋原住民共生伦理。本研究基于深层生态学与处所理论，试图探讨奥台尔笔下的海洋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共生实践及其生态处所构建。本研究以海洋原住民的生态节制为起点，探讨原住民如何在生存压力与外部资本诱惑的双重考验下坚守获取底线，从而为共生伦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石。物质层面的极度节制在斩断人类的征服欲后，便为跨越物种鸿沟的灵魂契合提供了可能，原住民将祛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广袤海洋中的动植物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行为上的克制与精神上的契合最终必然指向空间本体论意义上的情感归属，原住民必将在流动的蓝色空间中寻获身份认同，完成从物理生存场域向精神生态家园的升华。

一、向海求生中的生态节制

19 世纪的太平洋西海岸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末端，更是全球资本主义早期海洋贸易扩张的血腥前线。欧美商人发现太平洋海獭皮在中国市场能换取巨额利润，随即以贸易站为据点沿西海岸搭建起跨洋商品链条。商业捕猎在数十年间把从阿拉斯加到下加利福尼亚的海獭逼至近乎灭绝，被征发的阿留申猎人成为这场“大猎杀”中最有效率也最具悲剧性的执行者（Igler 109）；紧随皮毛、鲸油贸易而来的疫病与暴力，沿岸原住民人口在短短百年内急剧萎缩。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强行闯入，使原本封闭、自足的加利福尼亚海岸生态系统遭遇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冲击。斯科特·奥台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生态浩劫及其背后的文明冲突，将浓厚的生态意识融入其文学书写之中，创作了以海洋为核心叙事场域的《蓝色的海豚岛》、《黑珍珠》与《齐娅》，并不同程度地触及北美原住民及其根植于族群文化的传统生态观。

奥台尔笔下的海洋原住民向海而生，却不同于视海洋为资源的殖民者，他们在面对广袤且资源丰富的海洋时展现出一种克制、内敛的生态伦理，即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必须基于维持生命的生存底线，而非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海洋原住民取之有度、不妄索取，与殖民者将海洋彻底物化的掠夺式开发形成本质对立，天然契合旨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深层生态学。

深层生态学的伦理先声可追溯至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利奥波德主张把伦理共同体的边界扩大到土壤、水、动植物，使人由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普通的成员与公民”（204），强调“当一件事物倾向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时它就是正当的，反之则错误”（224–225）。基于此，生态节制是对共同体的义务，克制索取不是对人的剥夺，而是普通成员维系共同体完整的责任。1973 年，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恩·奈斯（Arne Naess）明确界分了两种生态立场：浅层生态学将自然视为服务于人类利益的资源库，环境保护以维护发达国家民众的健康与富足为核心目标；深层生态学则承认所有生命形式的内在价值，要求从根本上摒弃人类对自然的主宰与剥削姿态。奈斯主张代之以“关系的、全域的形象”取代人在环境中心的二元图式，即把有机体看作生物圈内在关系之网上的“纽结”而非可任意取用的孤立物件（95–96）。一旦自然不再是等待支取的客体，人对自然的索取就必须为自身划定界限。比尔·德韦尔（Bill Devall）与乔治·塞申斯（George Sessions）以“生命中心平等”为最高规范之一，主张人“以最小而非最大的干预”作用于其他物种与地球，并把这种取向概括为“手段简单、目标丰富”（68）；1984 年，奈斯和塞申斯总结出深层生态学的八大行动纲领，第三条明确规定：“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外，人类没有任何权利去减少自然界丰富的多样性。”（70）这一理论锚定人的真实生存需要，对自然的索取以满足需求为限，天然契合生态系统循环规律，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无休止攫取自然剩价值的合理性，为人类向自然的物质索取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人何以愿意履行对自然共同体的生态节制义务？福克斯（Warwick Fox）“超个人生态学”把自我实现理解为一个不断“认同”的过程（249）——那个超越了利己的、个人化小我的“大我”，正是在向人类之外的自然敞开、向生态意识敞开的过程中生成的（197–198）。生态节制是自我边界扩展后的自然结果：索取越少，“大我”反而越丰盈。生态节制始终是深层生态学一以贯之的实践内核，它要求人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把物质索取约束在基本需要之内，以最小干预换取人与生命共同体的共同繁荣。

在奥台尔的《蓝色的海豚岛》中，女主人公卡拉娜长达十八年的孤岛求生实践呈现出与传统的西方荒岛求生书写截然不同的生态叙事，正是践行生态节制的生动体现。卡拉娜是印第安部落卡拉

斯-阿特村头人科威格的女儿，她深爱这座祖祖辈辈安居的海豚形小岛，潮起潮落，每一寸海岸、每一处礁石都藏着她的成长印记。然而，卡拉斯-阿特村因与阿留申猎人为争夺海獭资源爆发冲突，卡拉娜的父亲作为头人也在这场斗争中牺牲，最终部落元气大伤，生存难以为继，只得乘船迁徙避险。撤离海豚岛之时，弟弟拉莫因贪玩而被遗落在海豚岛，卡拉娜不顾海浪汹涌与族人阻拦，奋力游回海岛寻找，却最终错过白人的商船，被迫留守海豚岛，在孤立无援中开启了与自然相依相伴的孤岛生存之路。

在荒野环境中，建立一个能够抵御恶劣天气与野生动物侵袭的庇护所是人类维持生命存续的首要基本需要。在传统的西方海洋殖民叙事中，开拓者确立自身空间霸权的第一步往往是砍伐与重塑——通过破坏原生植被来宣告人类中心主义的降临，比如西方荒岛文学开山之作中《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的鲁滨逊就是通过疯狂砍伐树木来建立一个带有强烈防御色彩的“文明堡垒”，进而确立自身对荒岛的统治权；又如儒勒·凡尔纳《神秘岛》（*The Mysterious Island*, 1874）中的五名美国流亡者降落太平洋荒岛后为了确立空间霸权大规模砍伐森林建造桥梁、烧制砖块，甚至使用自制的硝化甘油炸药炸开原生岩壁，强行改变水流方向，将山洞改造成豪华的花岗岩宫。而《蓝色的海豚岛》中的卡拉娜在蓝海豚岛的高地上建造围栏时却展现出了海洋印第安人特有的、顺应海洋物质循环的生态节制。留岛初期，为了建造新居所，卡拉娜将目光投向海洋的馈赠——珊瑚湾，那里堆积着许多过去被海浪冲上岸并自然腐化的鲸鱼遗骨。卡拉娜将这些巨大的鲸鱼肋骨一根根拖回高地、深埋进泥土，并缠上海洋中随处可见的海草，最终筑成了防风防兽的篱笆围栏。深层生态学把“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设为人类干预自然的唯一正当理由（Devall and Sessions 70），鲸骨围栏切实符合卡拉娜在孤岛上“防风防兽”的真实维生之需。在“关系整体场”的视野里，有机体是生物圈内在关系之网上彼此勾连的纽结，抽离任何一环都会改变整张网的构成（Naess 95）。海豚岛是封闭且脆弱的海岛生态系统，卡拉娜主动放弃砍伐活态植被在本质上将人类生存需求对原生生态的干预降至最低，是对海岛有限生态承载力的自觉守护；被海浪冲上岸的鲸鱼遗骨是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代谢的产物，卡拉娜将人类的生存需求完美嵌入自然已有的物质循环链条对其加以利用，正是生态节制的高阶实践。这种“取之于海，用之于生”的被动式获取既确立了自身生存空间，又尽可能避免了对岛屿活体植物系统的破坏，维系了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明显有别于阿留申人无度猎杀海洋生物的主动式劫掠。

诚然，卡拉娜在海豚岛上的生存实践展现了剥离资本逻辑后纯粹的生态节制，但是在极度孤绝的自然环境中，这种节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迫不得已的生存底色。那么，检验海洋印第安人生态伦理是否具有真正的内在约束力，更要审视其在面对“无限”海洋财富时的抉择及其对非人类存在物的态度。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福祉与繁盛本身即有价值，此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深层生态学纲领第三原则更把人类的索取限定在“基本需要”的范围之内（Devall and Sessions 70）。自然存在物即便能够兑换为巨额财富，只要它超出人的基本需要，人也不具备占有它的道德理由。非人物种与生态共同体的利益，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不是人类、或对人没有工具价值”就被忽略（Eckersley 57）。在奥台尔的海洋文学谱系中，西方殖民者将海洋视为无限攫取利润的资源库，将珍珠、海獭、鲸鱼等一切自然存在物转化为可量化的物质资源，正落在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这一绿色思想“最根本分歧”中被批判的一极（Eckersley 33），他们预设海洋资源储备无穷，而深层生态学首先确认的却是地球供给的有限性（李萌羽 44）。其笔下的印第安原住民却对可以直接

转化为巨额财富的自然造物表现出了天然的免疫力，按照“自愿简朴”的准则过一种“手段简单、目标丰富”的生活（Devall and Sessions 68），守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与韧性。海洋原住民对于巨额海洋财富的“无动于衷”正是对“物质战利品”的主动放弃（Buell 144），是他们千百年来与海洋共生共荣所形成的内在的伦理自觉。

《黑珍珠》中的印第安老采珠人索托·卢宗（Soto Luzon）极其具象地展现了原住民在面对海洋诱惑时的生态克制。卢宗居住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潟湖边缘，他比任何其他受雇于西班牙珍珠商人的采珠人都更了解海底的生态结构，也清楚地知道哪里藏有最丰厚的珍珠群。然而，在拉巴斯珍珠业疯狂扩张的浪潮中，卢宗常年过着近乎赤贫的生活，仅采集极少的珍珠换取少量金钱以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尤其是当小说主人公、深受西班牙商业文明影响的少年拉蒙（Ramon）在海底发现并试图占有那颗完美无瑕的巨型黑珍珠时，卢宗没有表现出一丝惊喜亦或贪婪，只有极度的恐慌，其守护的正是“基本需要”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拉蒙和其他珍珠商人眼中，天堂之珠意味着庞大的帆船舰队、华丽的宅邸、在白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无尽的金钱；而对于依靠海洋世代繁衍生息的印第安人卢宗而言，资源丰饶的海洋从来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存在”，它同时是众多海洋生物“至关重要的栖息之地”（李萌羽 45）；黑珍珠首先是海洋共同体中自有其内在价值的自然元素，它“对人没有工具价值”并不构成可以被掠夺的理由（Eckersley 57），若强行夺取必将招致恶魔魟鱼（Manta Diablo）的惩罚。拉蒙强取天堂之珠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式掠夺性榨取，而卢宗对这颗无价之宝的避之不及则确立了海洋原住民的生态自律：当自我认同不断向非人存在扩展，“大我”的丰盈便不再需要以占有外物来确证（Naess 225–227）。无论自然造物何等诱人，只要它不服务于基本维生目标，人类便没有权利去占有它。由此，主动放弃超额索取并非自我的收缩，反而为自我实现敞开了途径。

奥台尔深刻揭示了原住民向海而生中的生态节制。海洋原住民向海而生的节制观是具有高度反思性的生态自觉，正是因为他们在物质获取上保持了极度的节制，坚决拒绝将自然异化为无尽榨取的商品库，才没有被资本逻辑异化为唯利是图的冷酷屠夫，从根本上肃清了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为他们跨越物种鸿沟、与广袤海洋中的生灵建立平等的灵魂互动提供了坚实的伦理基石。

二、生灵互动中的和谐共生

海洋原住民在向海求生的过程中极度节制自身对于自然的物质索取；物质上的克制则进一步为海洋原住民跨越物种鸿沟、与自然生灵建立平等的灵魂互动提供至关重要的伦理前提。

在传统西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二元论语境中，自然界中的非人类存在物往往被强行剥夺内在价值而被贬低为缺乏主体性的客体资源，是被征服、驱逐和利用的对象。西方基督教传统消解了古代泛灵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神性赋予，将人类从自然秩序中抽离出来，确立了人作为“上帝造物之主宰”的特殊地位，人与自然由此形成了明确的主客二元等级——自然不再是具有自身存在意义的生命共同体，而降格为上帝赐予人类、供其支配与耗用的工具性资源集合（White 1205）。林恩·怀特（Lynn White）直指这一价值预设的核心本质是：“除非我们摒弃基督教的核心公理——即自然除了服务人类之外别无存在的理由——否则我们的生态危机将持续恶化”（1207）。人类中心主义将道德关怀的边界严格限定在人类物种内部，非人类存在物因被认定不具备理性、自

我意识等“人类专属”特质而被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Eckersley 43, 50）；它们只能以纯粹工具性手段的身份进入人类视野，自然本身被视为“若无人类劳动便毫无价值”的存在，这一价值等级秩序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提供了默认的伦理正当性（Eckersley 22–23）。

深层生态学则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层生态学坚持“生物圈平等主义”，承认一切生命形式具有不依赖人类功利计算的内在价值（Naess 95–96）。人应如何与其他生命相处——生态自我基础上的共生。生态自我“无法不把自己认同于一切生命，无论其美丑、大小、有无感知”（Naess 225），其认同可以延伸到“一切生命组成的更大集合体”，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前提下“认同于一切生命形式”（Strumse 14）。认同一旦发生，人便“在他者之中看见自己”，即“自己活，也让他者活”（Naess 226）。共生是生态自我的题中应有之义，奈斯甚至特地以“混合共同体”（mixed community）命名“自觉而审慎地与某些动物亲密共处”的共同体，这首先在概念上为跨物种共生留出了位置（Naess 226）。生态自我基础上的共生是通过与他者的卷入和互动而实现，自我与他者的需要彼此指涉，“任何一方的繁荣都无法脱离另一方而单独求得”（Diehm 34）。这为共生补上了差异维度，真正的生态自我始终处在与这些差异的对话之中，其存在方式是“与他者共在”（being-there-together），并允许“他者在自我发现、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参与自我的创造”（Diehm 41）。共生由此呈现为一种双向构成：人塑造自然，自然亦反过来塑造人。深层生态学的共生主张并非纯粹的哲学玄想，当代生态学与生命科学均为其提供了来自海洋的实证。生物群落中广泛存在“至少使一方受益、而对任何一方都无害”的积极互动，当双方都从中获益时即是互利共生，例如，珊瑚礁的繁荣正有赖于此（Stachowicz 235）。贯穿整个动物界的共生关系，“正在把经典的孤岛式个体观念，转变为一种物种间互动关系模糊了有机体边界的观念”（Gilbert et al. 326）。以海洋为例，共生藻可为宿主珊瑚提供多达百分之六十的养分，一旦海水升温导致这一共生破裂，珊瑚便会“白化”，失去共生藻并死亡（Gilbert et al. 327）；生命从来不是以孤立个体、而是以“我们都是地衣”式的共生复合体方式存在（Gilbert et al. 336）。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的七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三项“多样性与共生”尤为重要：他反对把生存竞争理解为“杀戮、榨取与压制”，主张生命体应当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共处并协作”，并明确反对人类对海豹、鲸鱼乃至原住民族群的灭绝式摧毁（Naess 96）。在奥台尔的海洋叙事中，海洋印第安人展现出一种非功利性的生命平等意识，将飞禽走兽与深海巨兽从猎物或敌人的单一属性中解放出来，转而视其为拥有内在价值的灵魂伙伴。奥台尔的海洋叙事所呈现的跨物种的生灵互动共生深刻践行了深层生态学倡导的“生物圈平等主义”，承认所有生命形式都拥有内在的存在价值、感知能力与生存繁盛的权利，确认了万物生命的绝对平等。

在探讨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时，西方哲学史曾呈现出冷酷基调。17 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提出著名的“动物-机器（Bête-machine）”论，认为人类拥有灵魂和理性，而非人类动物本质上仅仅是没有思想、理性、意识或非物质灵魂的复杂自动机器，其所有行为都可通过纯粹的机械物理过程来解释（139–140）。如果动物只是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那么无论是俄国猎人屠杀海獭还是美国捕鲸船熬煮鲸油都不涉及任何伦理审判。要消解这种将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彻底客体化的冷酷逻辑，唯有打破人类作为绝对主体的单向视域。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中，人类以绝对支配者的目光审视动物。一旦这种单向的“看”被打破，一旦人类意识到动物也在凝视自己，便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动物的伦理关系。奥台尔笔下的海洋原住民通过跨物种的目光交汇完成了生态伦理的觉醒，在他们放弃杀戮、直面动物目光的瞬间，动物从被剥夺灵魂的机械动物还原为拥有感知的同等生命。

在《蓝色的海豚岛》中卡拉娜与野狗首领朗图的生死对峙完美再现了跨越物种敌意的和解。卡拉娜与拉莫独留海豚岛之初，拉莫不幸遭遇野狗群袭击身亡，而朗图正是这群野狗的首领。悲痛欲绝之际，卡拉娜将野狗群视作复仇目标，“我发誓总有一天要我回到那里，把山洞里的野狗杀光。”（O’Dell 45）失去弟弟的悲痛催生了对野狗群的极致仇恨，“杀光野狗”的誓言，本质是卡拉娜将野狗这一非人类生命完全归为威胁生存的异己者。此时的海豚岛对卡拉娜而言，亦只是承载复仇执念的生存空间。于是，卡拉娜打破部落妇女不得制作武器的禁忌，制造弓箭射杀野狗并点火烧毁野狗群所居之山洞，箭矢精准射伤野狗首领——一只长着黄眼睛的大灰狗。卡拉娜只差最后一击便能大仇得报，却在看到大灰狗倒在血泊中毫无还手之力时，拉紧的弓弦迟迟未能射出。“大灰狗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箭才没有放出去。”（O’Dell 86）复仇的怒火在这一刻突然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喻的犹豫与怜悯。卡拉娜原本计划乘胜追击彻底了结仇恨，却在亲眼目睹头狗的脆弱后，放弃了“杀光野狗”的誓言。这种突如其来的“无法射出”是关系性自我开始松动的瞬间：自我本就由其与他者、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地构成，而非封闭自足的原子（Beau 5），一旦卡拉娜在头狗身上辨认出一个会痛苦的主体，孤立“小我”的边界便随之开裂，人类主宰自然之特权在道德层面亦随之崩塌。卡拉娜放下了弓箭，更是放下了人类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生杀予夺的傲慢。这是卡拉娜对非人类生命共情的开始，她不再将头狗仅仅视为仇敌，而是开始正视其作为生命个体的痛苦，这份认知突破也让她主动走向受伤的头狗，将其背回高地。当大灰狗在岩石上苏醒时，“它的眼睛深深陷了下去，看我的目光仿佛来自脑袋的深处”（O’Dell 87）。人与有生命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外在、偶然，而是内在而具实质性的，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我们是谁”（Hallen 159）。在这个瞬间，卡拉娜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灵魂深度和痛苦感知的主体，大灰狗流露出的非暴力目光消解了卡拉娜心中的敌意，卡拉娜为其命名为“朗图”（意为“狐狸眼睛”）。在美洲原住民的文化中，命名是一种极其神圣的仪式，它意味着赋予对方身份，承认对方是拥有尊严与灵性的行动主体、并以“主动语态”而非物化的被动语态去对待自然（Plumwood 125–126）。卡拉娜对朗图的命名将其从无名野狗升格为有身份的伙伴，确立了基于生命的和谐共生关系。

在西方主流的自然哲学中，自然界的存在往往被强行置于“有用”与“无用”的二元对立之中。在工具主义的视野里，自然界仅仅是一个提供物质利益的工具舞台，非人类生命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们能否为人类带来实际的效用（Plumwood 142）。在这种“主人理性”的支配逻辑下，自然先被判定为缺乏内在意义，继而“沦为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沦为服务于主人目的的工具性手段”（Hallen 160）；如此，非人类生命便不再拥有自身价值，其意义只被折算为对人的效用。若遵循这一功利逻辑，在孤立无援的荒岛上消耗极为宝贵的体力和时间去救助既不能充当食物、又无法提供劳动力的野生动物无疑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资源浪费。卡拉娜在海豚岛上倾注心力无私照护受伤生灵的生态实践则瓦解了这一工具理性逻辑。卡拉娜将这份关怀最先系于了曾经的死敌——野狗首领朗图。卡拉娜将朗图带回高地后对其悉心照料，;朗图伤愈后，她任其在院口自由去留，给予其平等的生命尊重。早前，俄国与阿留申猎人曾驾驶红帆船闯入海岛在海湾中对海獭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在西方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海獭被彻底剥夺了生命主体的地位，转而沦为明码标价的皮毛资源。这场大屠杀重创了海岛的生态链，更在原住民与自然之间划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痕。然而，当捕猎海獭的再次离开，卡拉娜在海草区发现一只受伤较轻的小海獭时，她走向了资本掠夺的绝对反面救助受伤的小海獭，心甘情愿地承担起了对这个异类孤儿的跨物种抚育，完成了对人类殖民杀戮的深层

生态治愈。“我天天给它带去两条鱼……后来我带去四条鱼，也都吃光了，最后我带去六条……不管风平浪静还是暴风骤雨，我天天都给它带鱼去”（O’Dell 132）。她仔细端详着这只皮毛越来越光滑的小海獭，为其命名为“芒-阿-勒”，意为“大眼睛的小男孩”（O’Dell 133），将这个曾经的“白人猎物”郑重地纳入了如同亲属般的情感网络中，开始争取“在亲缘存在者组成的生态共同体中的生命成员资格”（Plumwood 121）。在漫长的喂养与照料中，小海獭“渐渐长大，伤口也开始愈合……长得有我胳膊那样长了，皮毛很光滑……”第二年初春，伤愈离开的芒阿勒带着两只初生的幼崽重返海湾，昔日濒死的小海獭如今生机勃勃地繁衍觅食，海獭的新生、繁衍与回归是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生动印证。海岛本是人与万物共生的栖息地，殖民杀戮割裂了生态平衡，卡拉娜则在满目疮痍的生态废墟上用海洋原住民特有的关怀与治愈为海岛生灵重新找寻到了生命的尊严与栖息之所，原本因外来者贪婪而支离破碎的自然之网在卡拉娜的悉心缝补下重又焕发生机。卡拉娜的生态关怀消解了殖民暴力带来的生态与心灵创伤，构建起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生生不息的理想生态秩序。

在《蓝色的海豚岛》的姊妹篇——《齐娅》中，步入晚年的卡拉娜在山洞中建立动物庇护所，主动救助受伤、残疾的弱势生命，进一步将跨物种关怀推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共生深度。“有一只腿断了的鹈鹕……还有一只海獭……还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海鸥……在海滩上捡到的燕子……”（O’Dell 163, 168）。卡拉凭借极大的生命包容心将处于生态链边缘的残障生灵汇聚在一起，用树枝和芦苇为受伤动物包扎治疗，以海洋原住民的生态柔情修补人与自然之间被暴力撕裂的纽带。正因为卡拉娜经由认同把自我延伸到自然存在物，“自己的最好也是他者的最好”（Naess 175），救护断腿的鹈鹕、受伤的海鸥才不需要任何功利理由。此刻，人与动物的共生关系超越了物种优劣的筛选，也剥离了“有用”与“无用”的审视，展示出对生命本体存在的无条件尊重。卡拉娜以一种超越功利与偏见的生态情怀筑牢了万物共生共存的伦理根基。

自卡拉娜开始对非人类生命的感知产生共情起，便意味着自我的边界已经跨越了物种的鸿沟，将身份认同从封闭的“小我”（ego）逐步扩展至整个生命共同体，并逐步达到了深层生态学所追求的自我实现（Naess 175）。在与海洋生灵朝夕相处的漫长岁月中，卡拉娜已然成为了海洋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最终，卡拉娜深刻体认了生命的内在价值，立下“永不杀戮”誓言：

> “自从那个夏天我和王阿勒跟它的小海獭交上朋友以后，我没有再杀过海獭。我有一件海獭披肩，一直用到破旧也没再做一件新的。我也没有再杀过鸬鹚去取它们美丽的羽毛……我也没有再杀海豹，取它们的筋了。需要捆扎东西的时候，我就改用海草。我也没有再杀过一条野狗，我也不想再用标枪叉海象了”。（O’Dell 138）

当卡拉娜最终立下永不杀戮的誓言时，她已化身整个蓝色海豚岛共同体的守护者。卡拉娜与海豚岛及自然生灵的生态互动最终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局限，形成真正平等的双向呼应，深化了跨物种共生羁绊，卡拉娜与自然万物彻底成为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

三、海洋栖居中的家园建构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1977）一书中关于“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亦称“处所”）

作了经典辨析：“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6），是“由经验所建构、由情感与思想所创造的现实”（9）。雷尔夫（Edward Relph ）把地方视为“我们直接经验世界的意义中心”（141），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把地方界定为融合位置、场域与地方感的“有意义的场所”，并指出任何地方都同时包含“物质性、意义与实践”的结合（Cresswell 16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处所理论逐渐由静态的容器转向关系与栖居：梅西（Doreen Massey）把地方看作“社会关系与理解之网络中的接合时刻”（154），英戈尔德（Tim Ingold）以“栖居视角”取代居高临下的建造视角，主张世界并非等待设计的对象，而是“因被栖居”才对人成为有意义的环境（173），马尔帕斯（Jeff Malpas）更强调世界唯有“在地方之中并经由地方”才向人显现（15）。综上，“空间”是缺乏人类情感意义的物理客体，“地方”则被人类的生命经验、身体感知与历史记忆深刻浸润后获得了独特认同感。在漫长的陆地文明演进中，“地方”往往与坚固的土地和清晰的边界紧密相连，海洋由于其流动性与变幻莫测则通常仅作为提供航运与渔业资源的物理场域，亦或阻隔大陆的危险境地，往往被剥夺作为“地方”的合法性。然而，在奥台尔小说中的海洋原住民的生态意识中，海洋已然超越生存空间的物理属性，升华为原住民生命之根得以深扎的精神家园，即生态学所述之“地方”亦或“处所”。

《蓝色的海豚岛》中印第安少女卡拉娜在漫长的孤岛生存岁月中依靠原住民特有生命体验，通过她与自然、动物的互动，逐步打破了海豚岛作为无意义物理空间的抽象定位，成为承载着依恋与敬畏的绿色家园，推动构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情的生态处所，最终形成“人类-生态-处所”互塑共生的闭环。

初期，阿留申猎人的入侵打破了岛屿原有的平衡，珊瑚湾的沙滩沦为血腥的屠宰场，卡拉娜的父亲战死滩头，随后，救援船载走全部族人、弟弟拉莫又死于野狗之口。海豚岛对卡拉娜而言彻底丧失了作为“家园”的意义，退化为被死亡笼罩的冷酷客体。面对危机四伏的异化空间，卡拉娜最初的空间实践完全是被动防御的。此时的海豚岛是作为充满敌意的客体压迫着卡拉娜，而她则是试图在恶劣环境中苟活的孤立主体，二者呈现出极度割裂的状态。想起部落记忆，卡拉娜将曾经的家园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堆灰烬作为这里曾经是卡拉斯-阿特村的标志”（O’Dell 46）。于卡拉娜而言，海豚岛和卡拉斯-阿特村本是“持久的同一与统一、因而得以与他处区别开来”的地方（Relph 45），把血缘、祖先、劳作节律与共同记忆编织为关系的接合（Massey 154），屠戮与撤离则抽空了这张关系之网，卡拉娜烧毁承载记忆的部落旧居不过是替已然发生的“去地方化”补上一个绝望的动作。她亲手切断自我与地方之间最后的同一性纽带，坠入“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深渊，即“一种普遍且可能不可逆的、对作为人类家园的地方的疏离”（Relph 143）。海豚岛亦随之沦为一个只剩敌意、无法被界定为关系性、历史性或与认同相关的空间——“非地方”（non-place）（Augé 77–78）。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卡拉娜每天站在岩石上向东远眺，期盼着救援船的帆影，其情感认同依然悬浮在已经远去的部落社会之中，脚下的海岛仅仅是她被迫滞留的“空间”，无任何情感驻留。

当卡拉娜尝试乘坐独木舟逃离海岛却在风浪中九死一生、被迫折返后，她与海豚岛的空间关系迎来了至关重要的转折契机。在探讨空间向处所的转化机制时，段义孚指出：“如果我们把空间看作允许运动（movement）的，那么地方就是停顿（pause）的。运动中的每一次停顿都使得相应场所有可能被转化为地方”（6）。每一次停顿都是意义生成的契机，短暂的停顿会产生临时的归属感，长期的栖居则会让场域成为承载个体与集体精神的“地方”。卡拉娜这次逃离的失败彻底击碎了她独自跨

越海洋的幻想，倒逼她完成了物理与心理上的双重“停顿”。当卡拉娜回到高地再次凝望这座岛屿时，她第一次用“家”来海豚岛：“回到家里我很高兴。我所看见的一切——海草里嬉戏的海獭，守卫港湾的礁石和周围泛起的泡沫，以及飞翔的海鸥，冲过沙坑的潮水——这些都使我心里充满了欢快”（O’Dell 63）。这次折返是卡拉娜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次实践，此后卡拉娜才得以在海豚岛上“停顿”并“栖居”。人是“身处其环境之中的行动者”，世界正是在被栖居的过程中获得意义（Ingold 173）。卡拉娜最初修筑围墙、打造武器仍带有空间中的防御色彩，而折返之后，她依潮汐安排采集、按风向选择居所，逐步在海豚岛上栖居，海豚岛才得以有机会从物理空间逐渐升华为灵魂处所。卡拉娜坚定，“蓝色的海豚岛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别的家……我得造一所房子”（O’Dell 76）。卡拉娜重又开始接纳蓝色的海豚岛，由此，正式开启了海豚岛逐渐成长为承载卡拉娜全部生命、记忆与精神归属的家园的漫长历程。

真正对海豚岛处所意义生成起关键作用的，是卡拉娜与野狗朗图之间从生死对立到深度共生的关系演变。卡拉娜与朗图的生命联结始于变故后的仇恨，却在复仇追杀向救治共生的转折中，成为海豚岛向共生型生态家园转化的关键节点。地方的意义生成于自我与他者持续往返的关系之间（Malpas 15），尤其依赖实践有规律的反复（Cresswell 170）。人是与众多人类及非人类存在者共同栖居同一世界的“有机体-人格”（Ingold 5），日复一日的共生彻底打破了此前僵化的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壁垒，推动卡拉娜转向承认朗图的生命主体性，并为它取名“朗图”，以跨物种的身体实践逐步“演成”地方。正如段义孚所言，空间向处所的转化核心在于“价值与意义的赋予”（6）。卡拉娜生态意识的觉醒，推动了她与海岛上所有生命共生共存的生态处所雏形的建构。朗图死后,卡拉娜收养了那只黄眼睛、厚皮毛、步态与朗图如出一辙的后代，将对朗图的平等尊重延伸至其后代，并为其取名“朗图-阿鲁”（朗图之子）。朗图的生命在朗图-阿鲁身上延续，在过去与当下的双重意义叠加中，卡拉娜的生态伦理实现从个体践行到代际传递的关键跨越。此后，卡拉娜设圈套误捕其他野狗后“不想处置它们，只得把它们放走”（O’Dell 143）；意外套住偷食的小红狐狸后，即便被咬伤仍放它回峡谷。此刻，高地是对所有野生动物保持开放与包容的生态场域。

当白人的船再次到来时，卡拉娜沐浴更衣，披上海獭披肩，穿上亲手缝制的鸬鹚裙，戴上徒托克赠予的黑石头项圈与耳环，用蓝色泥土在面额绘制部落标志。卡拉娜没有因即将回归人类社会而抛弃这些海岛印记，反而把地方地方因此是“高度具身化”的 （Cresswell 175），本质上是将海豚岛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空间与时间在“地方”这一单一结构中汇合（Malpas 17），卡拉娜离岛时所携带的，正是多年岁月在海豚岛中沉淀的记忆。船起航时，卡拉娜站在甲板上“回头朝着蓝色的海豚岛看了很久很久”（O’Dell 162），最后一眼定格在海岛高地，这一深情回望，将蓝色海豚岛的生态处所意义推向终极。最终，卡拉娜承载着海岛的生态印记与精神内核离开，让处所意义突破地理边界束缚而通过人格化的方式得以延续，蓝色海豚岛彻底脱离地理空间属性，成为承载生命敬畏、情感联结与生态信仰的永恒精神家园，即便跨越重洋，蓝色的海豚岛永远鲜活。

在奥台尔的续作《齐娅》中，当卡拉娜这位在荒岛上构建了深厚跨物种亲缘的原住民被“解救”至秩序井然的圣巴巴拉传道院（Mission Santa Barbara）时，生态悲剧便无可挽回地降临了。卡拉娜无法在其中找到任何关系、历史与认同的接续，传道院成了典型的“非地方”（Augé 77–78）。本真的地方感来自对地方认同之整体“直接而真切的经验、不被种种时髦成见所中介与扭曲”（Relph 64），规训化的传道院却恰恰剥夺了这种经验，使她沦为彻底的“外在者”。卡拉娜最终在岩洞中平静地离

世：“她望着远方的大海。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不再呼吸了……她依然深深地思念着她出生并生活了半辈子的那座岛屿。她在内心深处思念着它，在一个她无法用言语触及的地方”（O’Dell 174–175）。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卡拉娜望向大海时，她的灵魂最终回到了蓝色的海豚岛，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卡拉娜用她的一生证明，即使身体被囚禁在异化的空间中，精神也终将回归承载着永恒生命记忆的原初地方。

无界的海洋生态网络是海洋原住民生命本体不可剥离的精神家园，但处所并非人类专属。真正的生态伦理要求人类在自然中谦卑筑居的同时承认、尊重并敬畏属于非人类生命的“自然家园”。奥台尔通过《蓝色的海豚岛》和《齐娅》中对卡拉娜与海洋、海岛相融相伴的生态书写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但他并未止步于此，更触及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后人类生态命题：自然空间首先且本质上是非人类生命的原生家园。在《黑珍珠》中，老印第安人卢宗对拉巴斯海域及恶魔魟鱼的敬畏，直接将海洋原住民的生态智慧推向更为深刻的境界。海洋原住民的生态意识从来不是“我的地方”，而是“我们共同的地方”，包含着对他者生命及其生存空间的根本性尊重。海洋承载着完整的生态秩序，海洋生物对其拥有先于人类存在的绝对主权。因此，在卢宗的原住民信仰体系中，泻湖及深处的洞穴是恶魔魟鱼的栖息地，即非人类生命的家园。然而，受虚荣心与利益驱使的西班牙采珠少年拉蒙却无视卢宗的警告，潜入了被原住民视为禁地的水下洞穴，从恶魔魟鱼的巢穴中强行剥离了那颗重达 62.3 克拉的“天堂之珠”。卢宗看到黑珍珠却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他严厉警告拉蒙：“‘把它扔回去，’他喊道。‘魔鬼鱼在等这颗珍珠，他不拿回它绝不罢休。他现在就在那里’”（O’Dell 41）。对海洋生态系统而言，黑珍珠是洞穴的一部分，拉蒙将其强行带走破坏了海洋家园的完整性，招致了灾难性后果，罕见的超级风暴将拉蒙父亲的采珠船队全部摧毁，三十二名水手葬身海底。在以卢宗为代表的海洋原住民的生态逻辑中，这场风暴正是被激怒的自然（恶魔魟鱼）对人类空间入侵与贪婪掠夺所做出的剧烈反噬。印第安老人卢宗的警告在拉蒙的脑海中回荡，他开始反思自己对海洋边界的僭越，试图将黑珍珠归还给恶魔魟鱼的洞穴却失败，最终将其献给教堂的圣母像。拉蒙的转变是海洋原住民的生态智慧在不同族群年轻一代身上的传承与延续。在印第安老人卢宗的生态伦理影响下，拉蒙终于学会在非人类生命的家园边界前止步，完成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者到跨物种空间伦理践行者的成长。将属于海洋的归还海洋，人类才能在生命交织的未知自然之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生。

四、结论

在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中，自然书写往往带有浓厚的陆地中心主义色彩，海洋在多数情况下被建构为充满未知的危险他者，或是供人类历险与征服的荒野背景。然而，在奥台尔的笔下，广袤的太平洋及其沿岸岛屿是一个流动、包容且有着严密物质循环法则的动态生态场域，这片蓝色的空间孕育了独特而脆弱的生命网络，为探讨跨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绝佳的空间范本。

纵观奥台尔的海洋创作谱系，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及其后裔构成了其海洋书写中最核心的原生力量，是拥有极高自然智慧的文明主体，其民族的记忆、信仰与生存法则早已与海风、潮汐和海洋生灵融为一体。在现代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语境中，深度审视这群海洋原住民的生态观为当代生态伦理建构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理论贡献。原住民的海洋生态观为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剂有力的解毒剂，他们视海洋为万物共栖的母体，为现代社会重塑人与自然的边界提供深

刻警示。同时，原住民摒弃过度榨取的思想深刻契合深层生态学的核心诉求，为人类在现代性扩张中避免生态灾难、实现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极其宝贵的本土化生存哲学。

自然是人类世代栖居的家园，亦是万物共生共荣的家园。在奥台尔的海洋图景中，海洋原住民在向海求生中不忘自我节制对自然的资源获取，更在与自然的互动中确立了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命主体性，将抽象的海洋空间升华为承载生命归属的意义处所，确证了海洋原住民与海洋之间相互嵌合、不可分割的生态共同体关系。海洋已然超越生存背景的客体地位，化作与原住民灵魂同构的精神家园。

基金项目：2026 年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外语实践课程体系建构”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Su Xiaoyu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3277-8349

Zhu Hua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5920-0717

注解【Notes】

① https://scottodell.com/，Accessed 29 April. 2026.

② https://scottodell.com/，Accessed 29 April. 2026.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ugé, Marc.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Howe, Verso, 1995.

Beau, Rémi.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The Blind Spot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Philosophies*, vol. 8, no. 6, 2023, pp. 112. DOI: https://doi.org/10.3390/philosophies8060112

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resswell, Tim. “Pla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edited by Rob Kitchin and Nigel Thrift, vol. 8, Elsevier, 2009, pp. 169–177.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郭建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Translated by Guo Jianzho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Descartes, René.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 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9–141.

Devall, Bill, and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5.

Diehm, Christian. “The Self of Stars and Stone: Ecofeminism, Deep Ecology, and the Ecological Self.” The *Trumpeter: Journal of Ecosophy*, vol. 19, no. 3, 2003, pp. 31–45. www.trumpeter.athabascau.ca/index.php/trumpeter/article/view/79.

Eckersley, Robyn.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Fox, Warwick. *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 Developing New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ism*.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0.

Gilbert, Scott F., Jan Sapp, and Alfred I. Tauber. "A Symbiotic View of Life: We Have Never Been Individuals."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vol. 87, no. 4, 2012, pp. 325–341. DOI: https://doi.org/10.1086/668166

Hallen, Patsy. "Ecofeminism Goes Bush."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ol. 5, no. 1, 2000, pp. 150–166. cjee.lakeheadu.ca/article/view/306.

Igler, David. *The Great Ocean: Pacific Worlds from Captain Cook to the Gold Ru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Ingold, 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Routledge, 2000.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李萌羽：《试论深生态学视域下的海洋伦理观》，《东方论坛》，第 5 期，2014 年，第 42–47 页。

[Li, Mengyu. "A Marine Ethics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Ecology." *Eastern Forum*, no. 5, 2014, pp. 42–47.]

Malpas, Jeff.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ssey, Doree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Naess, Arne.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Outline of an Ec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Rothen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Naess, Arne. "Self-Realization: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 *Deep Ec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George Sessions,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5, pp. 225–239.

Naess, Arne.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vol. 16, no. 1–4, 1973, pp. 95–100. DOI: https://doi.org/10.1080/00201747308601682

O'Dell, Scott. *The Black Pearl*. Yearling, 1996.

斯科特·奥台尔：《蓝色的海豚岛》，傅定邦译。新蕾出版社，2007 年。

[O'Dell, Scott. *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 Translated by Fu Dingbang,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2007.]

O'Dell, Scott. *Zia*. Bantam Doubleday Del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1995.

Plumwood, Val.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Routledge, 1993.

Plumwood, Val. "Nature in the Active Voice."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no. 46, 2009, pp. 11–128. DOI: https://doi.org/10.22459/AHR.46.2009.10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ion, 1976.

Russell, David L. *Scott O'Dell*. Twayne Publishers, 1999.

Stachowicz, John J. "Mutualism, Facilit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Communities." *BioScience*, vol. 51, no. 3, 2001, pp. 235–246. DOI: https://doi.org/10.1641/0006-3568（2001）051[0235:MFATSO]2.0.CO;2

Strumse, Einar. "The Ecological Self: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Anthropogenic Environment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vol. 3, no. 2, 2007, pp. 11–18. http://ejst.tuiasi.ro/Files/10/11-18Strumse.pdf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儒勒·凡尔纳：《神秘岛》，顾从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年。

[Verne, Jules. *The Mysterious Island*. Translated by Gu Congzhi, China Youth Press, 1979.]